

梁启超:在科学文化的视域中重新解读

姚雅欣¹,王 云²

(1. 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100083)

摘 要:从科学文化的视域重新解读梁启超,是不同于历史、政治、文化等传统视角以认识历史人物多元侧面的新路径,也是通过人文学者理解科学文化的新尝试。本文以梁启超结缘科学与投身文化事业为主线,揭示其科学观、科学方法、科学传播、科学认识论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探索。进而指出以人文情怀为基石的科学精神与内在的“文化理性”是构成梁启超在中国思想、文化及民族精神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动力所在。

关键词:梁启超;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近代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理性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3)06-0067-05

把梁启超视作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镇人物,无论在政治、社会抑或是文化、学术诸方面都不为过。虽然他的政治理想与行动迭遭物议,然其对改造社会、健全国民、阐扬文化、活跃学术的广泛关怀及其拳拳投入之情难有出其右者。其穿越20世纪中国历史的精神影响力,可谓“普遍的,无远不屈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1]从1890年在上海第一次接触《瀛寰志略》及一系列西学中文书籍,千年儒学熏陶下的梁启超开始结缘西学、科学、西方哲学,汇聚成1890年以降梁启超思想的潜流与行动表征。在西方制度、文化的撞击下,梁启超的人生角色经历了多元转换,从维新志士、流亡日本学者、欧美观察员直至专心回归学术与讲坛的文化导师,终其一生以文化、学术、精神救国为职志,这是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通向现代中国的历史坐标而存在的根基。

传统视野里的维新志士、参政阁员、博学鸿儒,只是梁启超多元侧面之局部;作为具有世界性、历史性与创造性视界的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西学与科学思想促成梁启超开阔、深邃、长远的文化战略眼光,或可言,其人生坐标很大程度上坐定于这后一点上。因此,在传统的政治、历史、文学等视域之外,拓出科学文化的视域以重新解读梁启超,从具有横断性、统摄性的科学文化视域,重新认识梁启超及其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演进、文化变迁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不仅是对多元性重镇人物进行多元化研究的有益尝试,而且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与社会转型具有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

一 科学与科学精神

梁启超关于“科学”思想的形成,与他自1890年开始接触西方思想,并不断接受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相同步。在57载的短暂人生中,梁启超科学思想的形成主要经历四个阶段,即:1890年—1898年结识西学,通过维新运动进行西方制度化探索的失败;

1898年—1912年逃亡日本期间,通过日文大量接触西学译著,是梁启超科学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形成的积淀阶段,也是他系统认识与宣传西方科学思想的重要时期;

1918年底—1920年春欧洲考察,目睹“一战”后科学在欧洲的境遇,丁文江等当时国内一流的科学家随行,得以最直接地亲历最前沿的科学发展及其异化的结果。这是梁启超科学思想经受实践验证进而得到锤炼升华的重要阶段;

1922年—1929年回归学术与著述,将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付诸著述、论辩与文化交流的实践,探索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协调共生。这是梁启超以科学思想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充实完善使其科学思想走向成熟的阶段。1929年殁于医疗事故,梁启超科学思想的进路骤然顿挫。

1. “科学”的内涵

梁启超将“科学”比作“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赋予其广义的内涵。“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这种学问叫做‘科学’。”^[2]不仅唯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是科学,“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3],即科

【收稿日期】2003-06-02

【作者简介】姚雅欣(1971-),女,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2002级博士生;

王 云(1978-),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哲学专业2002级硕士研究生。

学是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和。梁启超之“科学”，一注重以经验事实为学问之基底，二注重不同学问或相关学问间的关系，三注重分析、综合等科学方法的运用，四注重科学结论的自治性与普适性。籍此得出“近真的公例”，可见其科学的真理并不具有绝对的终极意义。进言之，科学不是孤立的、线性的、片面的、功利的概念，单纯而论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重经验、证据、知识与理性，不如别种学问可以速成，因而科学是循序渐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艰苦学问，绝非时下盛行的空谈空论。

通过 1896 年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两份教学大纲中对“西艺”的见解，可透视其早期科学观。“西艺”不单指西方的船坚炮利（即有形的技术，业果），而是作为一种普遍原理的科学理论，是应用科学的结果之源泉（业种）。待到明晰表述“科学”概念，盖较早见于 1911 年引述西方学者倭尔格对“科学”的界定，即“以研索事物原因结果之关系为职志者”。时至 1923 年，梁启超表达的科学观较前更为系统，科学概念本身已经融入了科学方法与科学思想。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科学家皮尔逊关于科学气质的表征，诸如普遍性、客观性、实证性、合理性、共有性、公正性等，无不蕴含于梁启超的“科学”内涵中。在当时国内盛论“科学”的思潮下，梁启超的科学观较卷入“科玄之争”的实战家更具包容性与超越性，一定意义上凸现了洞穿科学时代发展的战略性。

梁启超在其科学内涵中，进一步区分了科学与科学的结果。“应用科学改变出来的物质，或建设出来的机关等等只能谓之‘科学的结果’，不能与‘科学’本身并为一谈。”^[4]然而，由于注重短期可见的功利性，中国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真谛，只知道科学研究产生结果的价值，而未知科学自身的价值。洋务运动可谓国人不习科学真谛之明证。国人把 19 世纪以来广义而丰富的科学看得低、粗、呆、窄，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梁启超坦言，“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5]

梁启超还将科学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进一步认识。他将文化分为文化种、文化果两部分，“人类用创造或模仿的方式开积文化，那创造心、模仿心及其表现出来的活动便是业种”，即“文化种”；“活动一定有产出来的东西，产出来的东西一定有实在体，创造力终须有一日变成结晶，便是业果”，即“文化果”^[6]。科学发明是“业种”，是活的；通过科学发明来创造的机器是“业果”，是呆的。梁启超的文化包含了物质与精神的总和，并以“种”与“果”区别科学文化，其实质就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界定，但他尚未明确使用“技术”的概念。在梁启超关于“科学”的层析结构中，包含着“技术”的重要一极，虽然形成了关于“技术”较为全面和正确的认识，但未将“技术”内容独立于“科学”内涵。“科学”与“科学的结果”（技术）这种兼容认识的优势与局限无疑尽在其中。

2. 科学精神的不同层次

梁启超自鉴为“流质善变”的人，“不憚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终其一生思想与学术的演进、角色的转换与回归，其中损益无不源自以追求真理、审择与批评、自由、开放为表征的科学精神。“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所谓

研究精神者，归著于此点。”^[7]科学精神运用于治学，是其宏富而长青的学术成就；科学精神运用于政治，在当时荆天棘地、保守主义盛行的过渡时代，或多或少地成为他政坛失意终归学术之缘由。梁启超这样界定科学精神：“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8]其中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层，求真知识。相较于一般知识，科学贵在求真，因其求真故而得之愈难。他以客观求真的态度面对纷纭相竞的各路学说，主张“虚心研究，放胆批评”，并且“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9]。在当时的中国，趋新尚变之风难敌传统泥古之态，梁启超为求真理而不断触动积习成见，竭力批判武断、盲从、附会等社会流弊，并常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西哲名言来倾诉冲破固陋、追寻真理的心声。

第二层，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关系，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作有系统的知识。”系统包括横、竖两类，“横”指事物的普遍性，“竖”指事物的因果律，后者为增加新知识的不二法门。他指出，贸然武断是非科学的，需要分析与推断；零头断片的知识可能全无用处，需要探寻相互之间的关联。

第三层，可以教人的知识。知识通过教学相长，传习与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从而日渐扩大。读书听讲不惟得到其研究结果，而且一并承受得此结果之研究方法，进而可以用其方法来判别其正误。在科学精神的这层涵义中，实指广义的科学知识应该具有开放性与辐射性，其中蕴含了梁启超身体力行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的意向。

中国学术界因科学精神的缺失，所以生出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五种病症。想救治二千年而成的思想积习，梁启超指出，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别无第二剂良药，希冀中国文化添入科学精神这种有力的新成分而再放异彩。

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不仅仅在于其表述，更在于他广泛的学术实践与生活实践中。科学精神赋予他“筚路蓝缕，以开荒荆”式创新与开拓的勇气，科学精神赋予他突破程式教条、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不竭力量，科学精神赋予他以开放性与批判性不断超越本我的智慧之光，科学精神最终使梁启超与“中国新思想界之陈涉”的指称无法分离。

二 科学方法与科学传播

梁启超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理性、系统、深刻的认识，并没有止步于书面、理论或思辨的层面，而是具体而微地贯彻于科学方法与文化实践中，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互为表里，行知相长。作为博学多识、通古察今的学者，梁启超“感觉最灵敏，感情最丰富，视四周变动起而迎之感应之”^[10]，他随时与境而变，随“脑识之发达而变”，因而十分敏感地领受了来自西方知识体系却有别于国学传统的近代科学方法。欧游归来，他进一步认识到西方思想对于中国进步的积极作用，一在于“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它”；二在于西方“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同时告诫，研究西方却不可盲从，“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作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11]

科学在于求得真知识,因而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获得真知绝非易事。梁启超的科学方法主要有三:其一为穷究推理法,即“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淆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12]其二为综合归纳法,即“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其三为因果律,通过对许多有证据的事实进行层析因果推理,科学家“发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强盖然性的原则”,进而形成坚实的知识之网,当网扩大至涵盖一组知识的全部,即形成一门科学。因果律可为增加新知的有效手段。

梁启超将科学方法有效地应用于实践。梁启超眼中的兄长,“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13]20世纪初梁启超开创的新史学深受当时科学思想的影响,开创了历史统计学这一治史新方法,并主张广泛吸取多学科的先进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作为广义的、科学的历史学,要研究智力、产业、美术、宗教和政治等人类社会生活诸方面。新史学试图将传统史学提升到“科学”层面,引入进化论、因果律解释历史,并提出“因果进化史观”。1923年,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又对史论中的进化论、因果律提出质疑。历史为心力造成,心力既非物理的与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够完全支配,则历史不可全然如物理与数理那样得知其一切运行法则^[14]。由此可见,科学方法与史学属性是在新型与传统兼容的人文史家梁启超的思想中不断交错与磨合的历程。1920年以来相继成书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研究框架,皆为传统研究注入现代科学方法的开创之作。1923年,梁启超指出国学研究的两条出路,其中之一就是用客观的科学方法进行文献学研究。他将国学比作“世界第一个丰富矿穴”,从前用“土法开采”成效甚微;现在从国外运来许多“开矿机器”,这机器便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15]

梁启超改造中国、塑造新民为己任的炽浓责任感,使他的科学方法既非空泛的,也不仅仅停留于学术研究,而且随着西方思想的浸染,更多强调学术研究以致用的目的。他认识到科学方法具有传播与放大科学知识的无穷作用,是新民与强国的利器。因而强调“可以教人的知识”,注重通过科学方法将科学思想普及于社会,“方法普及于社会,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有发明。”^[16]为此,变法维新以来梁启超一以贯之地倡导学会、讲座、报馆、书籍,作为科学文明传播的有效途径,并以其独特的地位和“从未停止过自我完善的努力”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科学文明的传播。

针对闭塞萎靡的时局,梁启超主张“须将全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17]。1920年欧游归来即组织“共学社”,旨在译介西方书籍、刊行杂志、派遣留学生和开办图书馆。不久组织“讲学社”,以延请西方知名学者来华讲学为务。1920至1924年伯特兰·罗素、汉斯·德里克、杜威、泰戈尔等

先后到来,思想境界别开生面。他在中国科学社——“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任董事,在年会、生物学研究所多次讲演,祝祷科学社猛利发展成为“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18]。1917年退出政界后,他在清华研究院、南开大学、南京诸校任导师或讲学,一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讲学著述传播新知,践行“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的信念。

西学与科学的传播,当然离不开梁启超独有的常带情感的劲健笔锋。他开创兼容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的新文体,“作为一种传播西方思想或者为传统文化辩护的工具”^[19],学生张君勱则评价新文体是“改造国民脑髓之妙药”。梁启超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事新报》上译介阐释弗·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康德、边沁、伯格森等西方思想家的理论,使西方思想更易于被时人理解和接受,逐渐累积孕育出一个日新又新的思想世界。回到当时的语境,梁任公的思想与举动无疑激发了科学精神与人文传统相碰撞,促进了科学的传播与国学的阐扬,把学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国民进步互动地沟通起来。

三 科学认识的途径

求索强国、新民之路,必从根柢上变革中国。梁启超并不欣赏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对西学的引入,因为国人只看到“科学的结果”之炫目表象,并不知悉科学本身的真正价值所在。为使中国由内而外发生质变,梁启超经过戊戌变法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探索失败后,将视点转向精神、文化层面深层变革的探索。与此相应,其科学精神在认识论层面上注重心性涵养与精神生活,提出“慧观”、“烟土披里纯”、审美情感等科学认识的路径。

1. 慧观——科学经验的基础

科学观察是科学认识的首要途径。梁启超提出“慧观”,即科学的观察,以区别于一般意义的观察。“学莫要于善观,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慧观。”^[20]慧观的首要性在于以科学方法、科学理论奠基的科学观察是形成科学认识的先决条件。通过有效的科学观察,举一反三,见微知著,由表及里,由累积的知识促进现象的观察,从而点燃新知的火种。在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的指引下,已有知识绝非遮蔽新知的滞障。科学观察、科学方法、科学认识、科学理论构成相互依托与联动的有机链条。他还通过科学史例证来说明科学观察与科学认识的关系,如牛顿悟重力原理、瓦特悟蒸汽机原理、达尔文悟进化论、哥伦布觅得新大陆,无不与科学观察、精密推敲密切相关。

梁启超的慧观,就被观察物而言,是蕴含自然之理、人情之理的客观真实;就观察者而言,是具有一定科学理论并掌握一定科学方法的观察者;就对观察物的认识而言,决非盲目、被动的感受过程,而是在一定的思维与理论指导下,有目的、主动的科学观察。可见,在梁启超关于“慧观”的论断中,已经凸显20世纪30年代英国科学哲学家N·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的科学认识论之端倪。

2. Inspiration——自由意志与灵感

1901年梁启超译介了日本作家德富苏峰关于 Inspiration 的文章,并详加阐释。Inspiration 译作“烟土披里纯”,属于精神思维之一种。它“突如其来,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若是者我自忘其为我,无以名之”,是一种内在潜藏的精神意志与蕴积而久致灵感迸发。关于 Inspiration 的来源与功用,梁启超认为,“发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刹那顷,而千古之英雄豪杰、孝子烈妇、忠臣义士以至热心之宗教家、美术家、探险家,所以能为惊天地泣鬼神之事业,皆起于此一刹那顷,为此‘烟土披里纯’之所鼓动。故此一刹那间不识不知之所成就,有远过于数十年矜心作意以为之者”^[21],其动力“诚不可思议哉”。马丁路德、哥伦布、卢梭的旷世伟业与英雄的人格魅力无不为此意志与灵感所激发、支撑与驱使。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梁启超出于救世的现实关怀,将 Inspiration 与激发救国新民的情怀与意志结合起来,得于政治宣传与民众鼓动。然而从学理上看,Inspiration 与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特别是科学认识更有着持久的内在关联。梁启超作为早慧超常、博学精进、勤奋不辍的学者,也是一位元气淋漓的性情中人。他长期治学的投入与博通不可能不激发出 Inspiration。可以说,Inspiration 既是梁启超的为学体验,也是他获得科学知识进而形成科学理念的独特手段之一。1895年,梁启超曾回顾他的“新学”思想由三种原素混合构成,一为先秦诸子与经书,二为外来的学问(西学),三为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异理想^[22]。随着接触与消化西学思想的增进,梁启超的科学思想与主观理想当在不断充实之中。Inspiration 可为综合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等诸种精神的一种思维状态,与科学认识中的灵感、直觉等价。长期积淀的潜知潜在特殊条件下被激活,并不一定按常规的理性或逻辑来运思,而是突发的、飞跃式的认识跃迁,转瞬即逝,不可名状,即所谓“来也如风,人不能捕之,其生也如云,人不能攫之。”可得之道,唯有精诚。

在梁启超的科学认识论中,既有渗透理论的科学观察等常规逻辑通道,也未忽视诸如 Inspiration 直觉灵感的非逻辑通道,并与他所称许的“自由意志”相联通。梁启超认为“自由意志之所以可贵,全在其能选择于善不善之间而自己作主以决从违”,进而指出“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23]抹煞客观与科学理性而空谈 Inspiration 与自由意志,是盲目的与毫无价值的。科学理性与 Inspiration 相互补充,构成科学认识必不可少的主脉与支流。

3. 科学认识的审美之维

梁启超始终把科学置于民生、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广义语境下思考,把对科学从学理上的认知扩展到更广阔的层面。一方面建构日益丰满的科学认识的框架,另一方面认为科学与理智并不能穷尽人类认识与生活的全部,而审美需求(美)与情感需求(爱)与科学理智构成人类认识的“两极”。“‘科学帝国’的版图和权威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24]美是人类生活一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之最重要者。审美与情感作为人类的本能,具有独立性、普

遍性与超越性,在科学认识中不可或缺。“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25]因此,梁启超倡导美术可为理性所不能为,揭示自然之美(“对境之赏会与复现”),微妙情态(“心态之抽出与印契”),非写实境实态的理想状态(“他界之冥构与募进”)。通过对美的赏会,以充实生活之美,医治精神世界之空虚。

梁启超以开放、高远的人文情怀认识科学,诠释科学,将科学理性的认识与精神审美之涵养置于同等高度来阐扬。在“科玄论战”正酣之际,1923年梁启超真正为科学与人生的真理而宣言,“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26]这一论断无疑为当时科学认识之干涩、人生观认识之偏执开辟生面,注入了滋润与公允的活泉。

四 镶嵌在近代化历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梁启超在对西方文明精髓加以吸收整理、普及推广,日渐形成其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正在经历着激烈而深刻的碰撞。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中,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角色与功能的定位,如何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一直是梁启超思考的时代课题。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他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27]梁启超对中国与中国文化持坚定的信念,即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治实体,还是一种文明,一个文化理想和信仰的宝藏;他自视为中国国家的一员,一个文明的参与者,一套独特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的载体^[28]。因之他对中国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积极肯定中国文化的整体价值。从文化与文明、价值与信仰的高度积极主动地汲取西方近代文化,其实质在于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来审视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最终使其嵌入世界文化圈而发挥独特的作用。

中国及其传统文化近代化的创制、发生和展开所面临的危机以及蕴含的活力,都“镶嵌”在东西方文化交往的过程中。面对欧洲人由“科学万能”到“科学破产”的急速转变,1918年末至1920年春梁启超亲历欧洲时局、慎思科学境遇,得出“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的论断^[29]。他并未因科学在欧洲的境遇而菲薄科学,以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之进展,进而从科学滥用所致精神世界的困境中、从西方思想界的浑沌迷惘中,洞悉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救济精神饥荒”方面的独特优势。他说:“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30]东方的人生观以精神生活为第一位,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学习西方的知识、方法及科学文化,为东方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以东方文化的内在效力拯救物质极度膨胀导致的精神迷失。

近代中国社会的低迷、传统文化的亘古未变,与西方科学文化形成强烈反差。但这并未动摇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更坚其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转型的志向。西方近代化是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的,因而以科技发展作为

衡量社会与文化进步的主要标准。但是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并未表现出对科学的极端崇拜,科学没有被视为法宝或者视为振兴中国的“万能钥匙”。原因在于梁启超眼中19世纪末以来中国面临的全面挑战不仅是社会政治问题,而且是宗教问题、文化问题,中国实际处在一场深刻的文化危机中。因而他没有从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出发,而是从文化价值的高度来认识科学,引进科学,从而得以在更开阔、更长远平台上审视科学的本质,提出“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31]的命题。他把科学精神置于“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考量,指出西方科学健康发展不过是文艺复兴以后百余年间的事,“一百年的先进后进,在历史上值得计较吗?”^[32]以世界的、历史的宽广且深邃的视野,为身处弱势的中国传统文化注入复兴的信念与策略。

中国文化的绝大责任,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33]西方先觉之士希冀通过协调东西方文化来寻求世界文明的曙光,中国——特别是中国新民之青年肩此重任。梁启超在为重建民族新文化不懈努力的同时,也为塑造近代化的新民“做出了独特探索。通过中国精神文化与西方物质文化的有机融合,化生出属于世界与人类的新文明与新民。“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34]他所塑造的一代新民,善于调和优秀文化,既非西化的,也非纯中国式的,而是二者的有机整合。一代新民须将个体与世界相交融,“托底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35]

梁启超深切关注中西文化的异质性。面对中西文化间实际存在的巨大势差,他指出两种文化可资镜鉴的互补性,以求二者融通共生。他从精神与心性、物质与知识的不同本质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定性,其实在文化性格的差异中已表明人文文化(东方)与科学文化(西方)的异质性与互补性。这是一段不曾被人关注的从世界文化大视野发出的关于“两种文化”的论述,直至1956年英国科学家C·P·斯诺从学理上提出“两种文化”的分疏,关于“两种文化”的思考才引起持久而广泛的关注。作为投入世界文化洪流的“过渡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对“两种文化”的感受与思考,无论从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还是视野的高度与广度,抑或社会转型时期文化更新的必要性与可操作性来看,都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检视。

纵观梁启超的科学精神以及对待科学的态度,始终贯穿一种内在的“文化理性”。当直面世界性现代科学的发展时,他的科学文化观自开始便不是单极的。梁启超经历科学从生疏到渴求与实践到亲历其优劣再到重新思考其发展,从未间断地探寻科学演进与社会变迁、文化断裂间如何确立和谐的关系。作为感情炽烈、视野开阔、新思交相簸荡走在时代前列的学界泰斗,对于科学,梁启超未曾流露过一点偏颇、激进的言辞,特别是面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差,他

则积极探索现象背后的思想根源与文化根源。梁启超多元、包容的人文情怀与善疑、求真、创获的科学精神的内在融会,构成他内化于血脉的独特的“文化理性”,从而可以对唯科学或反科学倾向提出公允的应对策略。他那远远超出所处时代的奠基于人文传统的科学文化观,注定在人类历史的时间轴和空间域里不息地奔流。从科学文化的视域重视审视与解读梁启超,其价值也许正在于此。

【参 考 文 献】

- [1][10]郑振铎.梁任公先生[J].收录夏小虹编:追忆梁启超[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64.
- [2][4][23][24][26]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1923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中华书局,1988.22,21.
- [3][5][8][12][16][18][31][32]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九.3-8.
- [6]梁启超.什么是文化(192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九.97.
- [7][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四.78,65.
- [9][11][33][35]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下篇)之七“彻底”、之十三“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之一“世界主义的国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三.21-27.
- [13]梁启超.病床日记[J],收录夏小虹编:追忆梁启超[M].428.
- [14]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3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1.
- [15]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年),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420.
- [19][美]纪文勋.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M].程农,许剑波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67.
- [20]梁启超.慧观(1900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46.
- [21]梁启超.烟土披里纯(1901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70.
- [22]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1895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四.22.
- [25]梁启超.美术与生活(192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九.21.
- [27][日]狭间直树.梁启超 明治日本 西方[M].日文本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28][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81.
- [29]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上篇)之七“科学万能之梦”(1920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三.
- [30]梁启超.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1922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
- [34]梁启超.新民说(1902-1905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7.

(责任编辑 郭晋风)